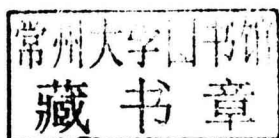


读书笔记

(十一)

周金康·执笔

读书笔记



20010年1月

目 录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稿·····	1
一个扭转中华民族乾坤的“甲子”·····	1
党领导人民实现伟大历史变革·····	6
经典中国·辉煌60年·····	8
中国国庆60年：历史坐标下的梳理与使命·····	10
葛洪升畅谈“宁波帮”建设宁波的往事·····	11
国史研究60年·····	16
 雷云同志文稿摘选（四）·····	19
两点感悟：成就和力量·····	24
 专家解读中国经济（六）·····	26
时政论坛·····	36
台湾问题述评（六）·····	50
国际政治论坛（五）·····	69
 制度视觉下的本土社会工作·····	80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的实践和研究·····	84
 列强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99
党在苏联留下的红色足迹·····	101
专家评说中苏中俄关系·····	103
宁波革命历程（二） ——宁波解放纪实·····	106
 解读宁波历史文化（四）·····	114
学习“国学”笔记（二）·····	144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稿

一个扭转中华民族乾坤的“甲子”

石仲泉

新中国60年，按照中国传统历法是一个“甲子”，这是一个扭转中华民族乾坤的“甲子”。

一、新中国第一个“甲子”巨变

新中国60年是探索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60年，既有探索成功的欢悦，也有走入误区的痛苦。总的说来，这是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

（一）、由一个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完全独立、拥有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的自主国家。

（二）、由一个充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空前统一的国家。

（三）、由一个反动专制的封建半封建国家，变成人民群众做主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健全的国家。

（四）、由一个民族歧视和一个民族压迫深重的国家，变成各民族间平等互助、团结和睦的国家。

（五）、由一个近代工业十分落后的贫弱国家，变成国民经济得到巨大发展、正在走向富强的国家。

1949年国内生产总值不到679亿元，人均年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360美元，国家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

(六)、由一个被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掌控经济的国家，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七)、由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门户洞开”的国家，变成对外全面开放的国家。

2008年，外汇储备超过1.9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进出口总额超过2.5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

(八)、由一个充斥文盲、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变成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得到巨大发展的国家。

(九)、由一个广大民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难以聊生的国家，变成全国人民大都丰衣足食、整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的国家。

1949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50元，多数人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况。2008年，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稳定解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人口预期寿命由35岁提高到73岁。

(十)、由一个没有组织、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国家，变成城乡基层组织健全、社会管理渐趋完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

(十一)、由一个有国无防、屡受外国侵略和欺凌的国家，变成拥有强大国防力量、国家安全有充分保障的国家。

旧中国在1840年后的百余年间，先后丧失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现在，人民军队已成为能够抵御任何外来入侵之敌的钢铁长城。

(十二)、由一个没有独立外交和国际地位的国家，变成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家。

二、新中国两个“30”年的辩证比较

(一)、邓小平对前“30”年的评价

一是从新旧中国历史对比角度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有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

得过的进步。”上面十二个方面的概括就是根据这个思路作历史比较的。

二是从总结经验教训角度指出：“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开始，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问题了。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还说：“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

这两个评价的参照系不同，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邓小平对前“30年”的基调是肯定的。

（二）、胡锦涛对后“30年”的评价

怎样看待这两个“30年”的差别呢？应当注意两种倾向：一是将两个“30年”完全对立起来，或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一是将两个“30年”简单地直线化，认为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年”对前“30年”有拨乱反正一面，即不是直线式发展、而是转折性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说，近90年历史大体分为三个“30年”。除这两个“30年”外，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也可视为一个“30年”。就这三个“30年”看，第一个“30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个“30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三个“30年”，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所谓新中国的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即是延伸到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过这段延

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两方面成果。就实践成果言，一是在建国头三年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二是在过渡时期中，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说新中国前“30年”是后“30年”的准备，是因为党在这个时期已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问题。从党的八大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经历的挫折，都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准备。

三、新中国“甲子”巨变的基本经验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新中国60年的历史经验也是如此。前“30年”，探索发生的曲折和挫折，归根结底是在理论上没有科学地回答上述根本问题，在实践中没能正确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

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言，新中国60年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主要有三条：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强调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三是强调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其中最具创造性的，有四点：一是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强调只有一切从这个最大实际出发，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提出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即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四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活力。

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问题，最富积极意义的创造性的探索，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党的性质和宗旨。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表述，对党的先锋队内涵讲得更全面，对党的先进性规定的更完整，更具时代精神，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二是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即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及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能力。三是关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认为一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优秀分子，只要能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符合党员条件，都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对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四是关于反腐倡廉建设。

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认为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如果说马克思主义问题是讲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改变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改变中国走什么道路，党的问题是讲由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来改变中国，那么发展问题是讲要改变中国成什么样子，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摘自2009年8月3日《宁波日报》，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党领导人民实现伟大历史变革

一、三次历史性转变

中国发生的伟大变革，集中体现在我们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来相继实现的三次历史性转变。

第一次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发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新中国成立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关键一步。所谓“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就是说，以这一时间点为标志，不但结束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同时也结束了自明朝中叶以来几百年中华民族衰落的历史。毛泽东同志以及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开国元勋们，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开启者。

第二次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我们只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在1952年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在落后的俄国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但毕竟还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搞的。而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对于怎样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很多方面是相当成功的，这是我们在这一时期能够取得很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党的八大和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提出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思想，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我们经历了一段比较严重的曲折。毛泽东同志开始认识到，我们对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

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了较深的感受。特别是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可惜，他没有沿着这个正确的思想路线继续深入下去，而把主要精力和注意力很快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向上，与真理擦肩而过。尽管历经曲折，但社会主义毕竟让我们党搞成了，坚持住了，而且越搞越好，这确实是个伟大创举。尽管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从他创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点上讲，他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第三次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其标志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了改革开放最为关键的一步，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这是我们能够快速发展起来的关键所在。我们抓住机遇，毅然决然地打开国门，形成了全方位开放格局。这两方面的突破，之所以是历史性的，之所以意义重大，就在于它们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转变。我们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这条道路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和发展的。找到这样一条道路，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二、我们党为什么能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

第一，我们党是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党。

第二，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

党。

第三，我们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有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党。

第四，我们党是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党。

（摘自10月20日《人民日报》冷溶文章）

经典中国·辉煌60年

综合国力由弱到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从纵向比——1952年，5亿多人口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年平均增长8.1%，比1952年增加了77倍。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今，中国人民一天创造的财富，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

人均GDP由1952年的119元人民币上升到1978年的22698元，扣除价格因素，2008年比1952年增长32.4倍，年均增长6.5%，其中1979—2008年年均增长8.6%。

国力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更体现在国家的财力上。1950年，我国财政收入只有区区62亿元，到2008年突破6万亿大关，近60年增长了约1000倍！从62亿元增长到1000亿元，用了整整28年的时间；从1000亿元增长到1万亿元，则用了21年的时间；而从1万亿元到突破6万亿元，却只用了9年的时间。

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了37.9%和43.7%，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分别属于富裕型和小康型消费

结构。

指标	单位	1952年	2008年	增长倍数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679	300670	76.8
外汇储备	亿美元	1.39	19460.3	13999.2
城乡居民储蓄 存款年底余额	亿元	8.6	217885.4	25334.5

从横向比——1952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到1978年也只占到1.8%。到2008年为6.4%，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由1978年的第二十九位跃升到第三位，仅次于美国与德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9%。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2008年GDP折合成美元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329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跃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2007年，主要农产品中，谷物、肉类、棉花、水果等产量居世界第一；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棉布居第一，发电量居第二。

（8月10日《人民日报》
文章《迈向伟大复兴》）

中国国庆60年：

历史坐标下的梳理与使命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3日刊登邱震海的文章，从大历史和大文化的角度透视60年国庆对中国的意义。

一、建国60年和过去150年

从1820年开始，中国衰败进程加剧。中国曾尝试过各种办法，归纳起来无非是改良和革命两种，学习的模式从西方到日本，又到苏联。但19世纪末所有的改良努力几乎都告失败，最后只能诉诸革命的道路。于是20世纪爆发了两场革命，一场是辛亥革命，另一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归结到最后，都是仁人志士用不同的方法、途径和意识形态，试图拯救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此次中国国庆和阅兵，一言以蔽之，就是过去200年在全体中国人心中沉淀下来的渴望民族富强的愿望。

二、过去60年中的前后30年

正是由于前30年的工业、军事尤其是民族自信心等方面的基础，才使后30年的进步成为可能。从中国历史和文化角度看，1949年后创建的举国体制对于整合一个百年衰败的民族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必须看到，前后30年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是相同的，30年前的拨乱反正和开启改革进程，来源于中共党内的开明力量，而非任何体制外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中国的大多数进步，恐怕只能依赖于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内的开明力量。

但必须看到，若没有后30年的努力，即便没有文革，就是文革

前17年的经济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中，也没有继续维持的可能。因为前30年的谬误归纳起来就是，继续用革命的手段来从事现代化事业，用急躁和盲动的情绪替代科学的发展规律。

三、未来60年

未来60年中国面临从清末到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两大使命：一是建立现代化的保障框架；二是提升和整合中国文化，使之既有助于现代化保障框架的建构，同时也有助于东西方秩序的调适和平衡。中国模式能否持续，有乐观和悲观两种观点，但其中的关键是：中国模式中，究竟是否有自我完善机制的萌芽或支撑点？如何循着这些支撑点探索上述两个未完成的使命。

（摘自10月8日《参考消息》）

葛洪升畅谈“宁波帮”建设宁波的往事

10月20日，曾先后任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省长、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葛洪升同志在杭州接受《东南商报》记者采访时，畅谈宁波落实邓小平“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讲话精神的往事。

邓小平两条指示鼓励宁波甩掉“裹脚布”。解放后，宁波成为海防的前哨，不允许搞大规模建设。而且宁波是著名的侨乡，海外关系错综复杂。这两条现在看来是优势的特点，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却成为了宁波发展的“裹脚布”。1984年3月初，东海舰队司令员告诉他，舰队刚收到一份内部电报，通报了邓小平春节期间在深圳一带视察时的指示，提出再开放几个沿海港口城市，里面提到了宁波。他马上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信息，一次千年难逢

的机遇，立即开展各项准备工作，第二天就到现场为开发区踏勘选址。3月26日，他参加了中央召开的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开了十几天。他赶写了发言稿，基本就是讲了宁波两个优势，一个是宁波港，一个就是“宁波帮”。座谈会后不久，中央就正式宣布包括宁波在内的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几个月后的“八一”建军节，邓小平在北戴河听谷牧汇报沿海城市开放情况，小平同志问“宁波怎么样”，听了谷牧汇报后说：“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中央领导人讲动员宁波帮，这还是头一回。葛洪升认为，邓小平说的动员全世界的“宁波帮”，和李鹏同志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对他说的话“发展宁波为东方大港”，是邓小平对宁波作的最重要的两条指示，恰好给宁波发展松了绑。

动员“宁波帮”，很大程度上是“宁波帮”在动员“宁波帮”。仅仅隔了半个月，1984年8月中旬，包玉刚来函邀请宁波市领导访问香港。这也是自解放后，包玉刚第一次与家乡联系。9月上旬，葛洪升等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他们开始密集地会见在港的“宁波帮”人士。和“宁波帮”的交往就此起步。第二年的12月5日，应包玉刚邀请，经中央批准，浙江代表团访问香港，出席宁波市政府设立在香港的宁兴公司的开业典礼，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王芳为团长，葛洪升是副团长。8日，包玉刚宴请代表团，在港的“宁波帮”知名人士40多人应邀出席。席间，包玉刚把葛洪升、邵逸夫，还有香港宁波同乡会会长包从兴叫到一边，说：“我想把我们读书的中兴中学重新修建一下，花1000万港币，你们出多少，自己报，剩下的我出，你们看行不行？”到1986年上半年，包先生来杭参加港龙航空公司飞杭首航仪式，和我见面时说：中兴中学1000万

港币，邵逸夫、赵安中、包从兴、叶谋彰先生各出100万，不足的600万我出，请书记马上安排施工。葛洪升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点纳闷，像包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这1000万港币怎么会出不起呢？为了这点钱他何必要费这个劲呢？后来，我体会到，包先生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来做“宁波帮”的工作，让他们也一起出力支持家乡建设。同时，包玉刚用这种方式动员“宁波帮”，在当时背景下，是因为海外宁波人来家乡捐资投资实际上是有顾虑的、有情绪的。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动员“宁波帮”的关键。邓小平在北戴河听谷牧汇报时还说：“要派卢绪章同志（原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宁波人）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卢绪章乃是包玉刚的表兄。他曾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地下党员张公甫即以他为原型。抗日战争时期他以广大华行老板的身份与包玉刚来往，其间给了包玉刚不少的帮助。广大华行是今香港华润集团的前身。解放后，他出任外经贸部副部长，包玉刚才知道了表兄的真实身份。73岁的卢绪章受邓小平的委派，来到宁波就任浙江省和宁波市政府的顾问，他要协助宁波市做好“宁波帮”这篇大文章。他第一个想起的自然是包玉刚，但他也知道包玉刚的“心病”。文革开始后，包家的祖房被占用，祖坟也被扒掉。包玉刚传话说，祖坟是根，如果不能祭祖，就不回乡。

葛洪升得悉这一情况就抓紧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查到包家祖坟的石碑在“破四旧、立四新”时被扒掉，坟迁到了姚江大闸那儿，但到大闸附近寻找时，却不见一穴的踪影。原来这里要办厂，坟又迁走了。最后是从身在宁波的包玉刚的外甥陈蟾圣处打听到，包家祖坟已迁到了离镇海钟包村不远的一个叫神钟山的地方。在寻找祖坟的同时，也收回了包玉刚在钟包村的祖屋。其中他结婚用的一张古老精巧的七弯凉床，被卖走几十年，并三易其主，

花了半个多月时间，最后在舟山嵊泗的一户渔民家里找到了。经过六次登门商量，用一张1200元的新床换回了那张当时售价为150元的旧床。

包玉刚得知祖坟两度迁移、现在已修葺一新，不禁热泪盈眶：“我今年就回家乡！”1984年10月28日，包玉刚和夫人黄秀英以及亲友等十多人再次踏上了阔别30多年的家乡。回家第一件事，到坟前跪拜祭祖。第二天回到了钟包村的祖屋。第三天，包玉刚捐资2000万美元帮助宁波建设。

这一次，葛洪升陪同包玉刚参观了天一阁。当时，工作人员向包玉刚捧出《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并在那张稍稍有些发黄的页面上指出：包玉刚为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嫡孙。包先生非常激动，连说这是一个无价之宝，无价之宝。

包玉刚出资创办宁波大学，带动了海外“宁波帮”捐资兴办教育。创办宁波大学的计划，葛洪升等宁波市领导第一次赴港期间就带给了包玉刚，只是当时没有明说。那次，卢绪章对包玉刚说：“宁波是浙江第二大城市，人口近500万，但没有一所大学。宁波的发展关键是一个‘财’字，一是一无之才，也就是人才问题，一是有才之财，也就是资金问题。相比较而言，人才问题更紧迫些。”葛洪升说，那时拟定的宁波大学的规模是在校生2000名，按每人2万元计算，共需投资4000万元。

这次包玉刚举家回访家乡，带来了一份厚礼。抵甬之前，包氏先到杭州。葛洪升说：“晚宴过后，李伯忠先生（包先生的妹夫）私下对时任宁波市外办主任的卢良宝说，这次包先生回宁波，要给家乡人民送一份厚礼。良宝马上给我说了这件事，但什么样的厚礼他没有说。”到宁波后，午宴时，包先生突然拉葛洪升一同站起来，他非常高兴地说：“我要宣布一件事，我决定出资创办宁波大学。”坐下后，他又对葛洪升说：“建宁波大学，我出钱，您出地